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庄三红,刘张健.基于劳动价值论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4):76-81.

# 基于劳动价值论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庄三红 刘张健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从理论出场、理论主题、价值旨归与建构动力四个方面分析劳动价值论创立的过程,可以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迪。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

**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4-0076-06

任何时代的理论总是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被提出,进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以回应时代之问,解决时代之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sup>[1]</sup>。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项崭新的任务,需要遵循理论的指导并回应实践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不是资本逻辑,也不是片面追求要素回报最大化的效率逻辑。基于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搭建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理论构建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有其特定的出场场域、理论主题、阶级立场、发展动力,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明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点。

##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分析出场场域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sup>[2](P14)</sup>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出场的场域,即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实践的发展状况。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前期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其理论出场是基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场域。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彼此对立却又相互联系,资本逻辑的演化同时构成了雇佣劳动得以展开的前提。雇佣劳动成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劳动形式下,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了名义上的工资,成为了与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一样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这种认识否认了工人劳动与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模糊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这种场域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关注劳动的阐释与分析,强调劳动的二重性及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的阐释与对资本的批判,进而确认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学理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不是资

收稿日期:2023-0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分配伦理思想研究”(17CKS001)

第一作者简介:庄三红(1985-),女,福建泉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资本论研究。

通信作者:刘张健(1999-),男,山西晋城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957222034@qq.com。

本主义生产,更不是工业革命后的机器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场域,它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马克思未能设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实现了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成功地打破了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粗浅划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场域中,资本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构建过程中,应充分认清与把握资本的二重性,即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在劳动价值论的出场场域中,资本是与主导性地位的因素,资本增殖逻辑的“以太效应”逐渐放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普照的光”<sup>[3](P31)</sup>,从经济领域逐渐延伸到社会其他领域。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sup>[4](P726)</sup>,更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贯穿于整个生产和社会生活层面。资本所要反映的也不是简单的“物”的关系,而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运动关系,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范畴,马克思更侧重于批判资本的增殖与对工人的剥削。而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场域,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生产功能。从生产要素属性出发,学术界需要对资本的内涵重新界定,突显资本促进生产力提高并实现经济不断增长的动力功能。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5](P32)</sup>与此同时,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根本的改变,但资本内在的特性与规律仍然存在。资本具有扩张与逐利的特性,这种本性使得资本的扩张呈现出无序和过度的态势。如果资本过度进入公共领域,则可能存在公共产品和服务过度商品化、市场化的风险,进而导致社会主义生产的趋利

性。因此,对于特定的公共领域,党和国家应该规范资本的利用,避免资本增殖逻辑的权力演化。此外,党和国家还应该赋予资本在其能产生更高效率的领域以自主权,同时也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过度扩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劳动的二重性。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生产劳动的主体进一步扩大,劳动形式日渐多样,劳动领域日益丰富。这些新情况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需要回应现实劳动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如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有何异同?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量的变化与劳动生产率提升之间是何关系?数字劳动、科技活动、管理活动等新劳动形式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其性质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界定。首先,马克思将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分析不同劳动与财富创造、价值创造之间的不同关联。其中,具体劳动是生产力的主要表现,抽象劳动则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一区分蕴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具体劳动的生产效率与其使用价值成正比;另一方面,具体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减少生产使用价值时间的总和,进而减少价值量的总和,从而使得在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社会财富创造日益增加,而价值量却相对减少。这就能更好地解释现代科技运用过程中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在量上不一致的现象。其次,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生产是价值创造过程和使用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就价值创造而言,价值是人们抽象劳动的凝结,不包含任何物化劳动的成分在内,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创造过程脱离于物化劳动过程。相反,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决定劳动价值如何分配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sup>[6](P428)</sup>这就表明,物化劳动在使用价值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劳动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工具的条件下进行,才能创造财富。资产阶级避而不谈生产资料这一先决条件,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实际上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目的是让工人阶级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革命。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劳动作用的认识是客观的,既承认其在价值创造中的唯一源泉地位,也看到了其在财富创造中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必要性,更指出了生产资料结合方式是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就价值创造而言,劳动始终是其唯一的源泉。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基本立场不动摇,充分认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三是马克思论述了价值创造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价值创造并不是财富分配的理论依据,这在马克思对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中就已经作了阐明。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各要素参与生产作为制定分配原则的依据,财富分配涉及的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参与生产过程的要素种类等诸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分配与价值创造并非毫无关联。准确而言,价值创造的多少、价值创造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到价值分配。此外,分析劳动在价值创造中作用,有助于在财富分配过程中更好地坚持劳动立场。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向体制层面,尤其关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创造问题,但是不能用财富创造的理论或研究来取代价值创造的理论或研究,也不能把财富生产的意义强加于价值创造之上<sup>[7](P254)</sup>。当前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如何通过生产与分配的双向协调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发挥人民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与内生性力量?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展研究并做出阐释与解读。

##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遵循研究逻辑

每一种理论均有自身的体系与研究主题,理论体系的架构需要遵循内在的逻辑与研究思路。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中,马克思经历了一个通过现象到范畴,从核心问题研究再到本质揭示的研究过程,并搭建关于劳动与价值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商品是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生产者必须同时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为商品。其次,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商品二因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划分为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

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两个方面,并对不同的范畴内涵进行了理论阐释。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阐述了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之间的关系: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再次,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是劳动价值论重点考察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二重性进行分析,指出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只有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只有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才形成和表现为价值。这反映了劳动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性质,是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价值论的根本区别之一。此外,价值不仅是一个社会范畴,更是一个历史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暂时性的、历史性的阶段。最后,揭示身处于物质生产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重要出发点与重要落脚点。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价值本质以及价值源泉的问题。他指出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说明了商品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交换个人劳动的一种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通常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掉,成为商品拜物教的根源。

劳动价值论“现象—范畴—核心问题—本质揭示”的思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具有现实启迪。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要立足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基于经济发展中的现象与问题,进而明确理论研究的相关范畴与根本问题。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核心范畴展开的<sup>[8]</sup>。这些范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但其内涵应当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深化发展。例如,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的产生是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过程,生产关系则是在物质资料生产实践过程中,不断产生并更新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另一方面建立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又如,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有所差异,因此生产目的也不尽相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有计划的生产、按需分配以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在现阶段,我国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但仍存在着生产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对于生产内涵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生产力领域的要素或是技术创新,更应该拓展“总体生产”的内涵与视角,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一个统一体加以考察,进而推动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例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拓展为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及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机统一,所有制、分配与市场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逻辑整体性需要进一步的学理性说明与阐释。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理论范畴创新的具体表现,也是拓展理论张力的空间。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丰富范畴内涵,还应当进一步明确核心研究问题。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二是如何妥善且恰当地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的关系。两个核心问题相互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赋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以决定性作用,又要推动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作为,这需要进一步分析企业的特殊性与经济治理的复杂性。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单位之一,我国企业有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之分。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生产目的也有所区别。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企业不仅要实现企业发展的增值,更是服务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还发挥着国家经济发展压舱石的巨大作用。而非公有制企业,其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但这种生产同样具有二重性,既满足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也与资本增殖的本性相吻合。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应当置于政府与法律的有效监管,除了承担生产功能,还应进一步承担解决就业、合理纳税、回报社会等社会职能。就经济治理而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理顺的问题。政府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与优势,应当在新时代实现职能转变,加大发挥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导功能,同时做好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功能。简而言之,政府与市场的双向互动是我国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为了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更好地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

劳动立场,克服资本增殖逻辑、权力逻辑的演化,并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习近平经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结合,作了一系列系统的理论概括,提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人民利益、生产力解放与生产关系变革是贯穿其中的重要任务。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摆脱资本逻辑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以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定了指导原则和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还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等具体举措,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谋篇布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分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理论内涵,不断地深入挖掘其深层次价值意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营造良好的劳资关系、劳动关系及社会关系。

###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树立阶级立场与价值旨归

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仅在于发现事实,更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道路与方向,而面向未来的道路与方向必然有其坚持的阶级立场和价值旨归。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进而为广大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理论利器与实践指导。具体而言,劳动价值论通过彰显劳动、物质劳动的地位与人的解放三个方面,树立无产阶级立场,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命运。一是关于劳动的地位,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劳动价值论创立之前,经济学家们也强调要重视劳动的作用,将劳动提升到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原则的高度,但是他们从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入手,将劳动视为财富创造的手段,目的是占有财富,进而在现实层面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强制,劳动屈从于资本的力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扭转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以物为本的劳动原则,转而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劳动原则。二是劳动价值论彰显了物质劳动的地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年代是大工业发展的初期,物质劳动是当时的主要劳动形式。因此,马克思侧重考察分析了物质劳动,强调其作用和地位。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9](P591)</sup>,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迄今仍然适用。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影响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即大工业发展推动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变革,进而改变人的头脑,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依赖于物质劳动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物质劳动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并因发展的物质生产而具有现实基础。三是为无产阶级争取独立自由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根本使命就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因此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本身和无产阶级一样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除了分析劳动和价值源泉之外,还有许多关于人的解放的分析,这些观点和思想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例如,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指出,资本所有权规律转化为占有规律,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不断被异化为谋生的手段,并且转变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这与劳动的本质相背离,工人无法从生产过程中得到解放,相反陷入了更为全面的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属于自己,工人的劳动过程变成了机械式、片面化的劳动,工人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社会关系变得异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提出要让工人从商品生产的手段变成商品生产的目的。这就需要彻底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要遵循劳动立场,树立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理论价值旨归。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旨归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分析和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具体利益关系和矛盾,为解决利益矛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不断实现和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质的属性,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阶级属性。当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仅强调经济发展的结果由人民共享,更包含了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作为财富和价值创造的主体,人民必须通过劳动生产实现经济共同富裕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同步推进。第二,要树立“人之为人”的价值旨归。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4](P501)</sup>,

因此人只有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当下的中国虽然已经不存在阶级剥削,但是人仍旧处于对象化世界,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金钱的渗透而存在异化、生产过程中以“利益至上”的非正义性目标为主导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不断消灭现存条件下支配人的异己力量的存在,使人真正从对象化世界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三,要弘扬尊重劳动的伦理意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伦理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隐蔽的劳动不正义及劳动过程异化,不能很好地将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反观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伦理,如果受资本逻辑的影响,那么劳动伦理失范的问题也会存在。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合伦理性的批判中汲取理论力量,关注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伦理始终坚持的主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劳动在生产性劳动之上延伸出了非生产性劳动,经济类型也随着资本金融化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的局面。非生产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应该看到的是,生产性劳动和实体经济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决遏制务“虚”不务“实”的错误思潮,强调生产性劳动的主体作用,优先保障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全社会弘扬尊重劳动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习近平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sup>[10]</sup>这种判断旗帜鲜明地强调劳动创造幸福的作用,有助于在价值导向上营造“劳动光荣”的理念。

####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应理论与现实的挑战

劳动价值论从创立之初,就面临着各方的责难。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曾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论述,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关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描述与第一卷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抽象说明是相互矛盾的。萨缪尔森也曾就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批判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价值论更是经历着现实的诸多挑战。无人工厂与无人车间的出现,直接冲击了“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源泉”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动摇了劳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企业组织形式

的变化与管理形式的创新,也使得管理的集成效应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突显;作为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这些现象和问题都需要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给出相应的回答与回应。由此可见,理论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讨论与争议的过程,正是理论上的质疑与现实的挑战,才给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构建,不仅需要面对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的困境与挑战,更肩负着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难题的使命与任务。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与创新,需要回应几个问题。第一,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的创新并不始终是同步的。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实践仍在进行时,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仍有争议。因此,理论框架、核心范畴、研究命题还没有形成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学术界聚集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或是具体领域的分析,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就的学理性阐释以及宏观层面的理论总结尚有欠缺。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如何发挥?如何构建经济治理体系的逻辑层次?这些问题需要从中国经济建设进程中提炼经验,进而形成理论阐释。第二,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诸多概念及理论分析模型,均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本身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摆脱西方经济研究长期以来的影响,建构中国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范式,还需要构建和创新适恰的学术话语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从实践中汲取丰富的感性经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与提升。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上愈发重视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实践的结合,进行理论阐释并形成学科发展的主旨。例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扩大内需作为国内大循环格局中的战略基点,强调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各环节,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强调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是一个统一体的“总体生产”视角,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

形成了分析中国经济的整体性框架。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其关注的理论视野还需要具有世界眼光。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之中,尽管现阶段的发展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发展,相反是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将研究视野拓宽到世界范围。一方面,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逻辑仍然在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盛行,人们仍然难以摆脱被对象化的世界支配的命运。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更要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与中国经济类似的共同挑战,例如数字技术的运用、金融资本的利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其他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方案,也能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诸多借鉴与思考。为此,学习、研究、借鉴当前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时代场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具备的世界视角与天下情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周绍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J].社会科学文摘,2021(12).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1-25(02).

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ail:simple5222@163.com